

学人

文丛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

宋德星 著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学人

文丛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

宋德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 / 宋德星著.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1

(学人文丛)

ISBN 978-7-305-20755-6

I. ①国… II. ①宋… III. ①国际形势—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184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学人文丛
书 名 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大图景
著 者 宋德星
责任编辑 贾小芳 官欣欣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35.75 字数 45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755-6
定 价 148.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南大亚太论丛》

主 办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列)

- 蔡佳禾 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蔡永顺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陈志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樊吉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洪银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
孔繁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石 斌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
孙 江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王月清 南京大学哲学系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朱庆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石 斌

副主编 李里峰 毛维准

成 员 祁玲玲 舒建中 赵光锐

吴小康 宋文志

《学人文丛》编辑组

石 斌 蔡佳禾 李里峰

毛维准 舒建中 李恭忠

《南大亚太论丛》总序

“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得于 2016 年夏初创设并渐次成长，“南京大学郑钢亚太发展研究基金”之专项全额资助，实乃一大助缘、大善举；众多师友、同道的鼓励、扶持乃至躬身力行，同样厥功至伟。

此一学术平台之构建，旨在通过机制创新与成果导向，以国际性、跨国性与全球性议题为枢纽，将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具有内在关联之学科方向、研究内容与学术人才，集成为国际关系、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群”，对大亚太地区展开全方位、多层次、跨学科研究，并致力于承担学术研究、政策咨询、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功能。

所谓“亚太”，取其广义，乃整个亚洲与环太平洋地区之谓。不特如此，对于相关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亦属题中之义。盖因世界虽大，却紧密相连。值此全球相互依存时代，人类命运实为一荣损相俦、进退同步之共同体，断难截然分割。面对日益泛滥的全球性难题，东西南北，左邻右舍，各国各族，除了风雨同舟，合作共赢，又岂能独善其身，偷安苟且？所谓“发展”，固然有“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多重意蕴，亦当有“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价值取向，其理亦然。

吾侪身为黄门中人，对于大学之使命，学人之天职，理当有所思虑。故欲旧话重提，在此重申：育人与问学，乃高等教育之两翼，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大学之本是育人,育人之旨,在“养成人格”,非徒灌输知识、传授技能;大学之根是学问,学问之道,在“善疑、求真、创获”。二者之上,更需有一灵魂,是为大学之魂。大学之魂乃文化,文化之内核,即人文价值与“大学精神”:独立、开放、理性、包容、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秉持理想与信念。大学之大,盖因有此三者矣!

南京大学乃享誉中外之百年老校,不独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且英才辈出、薪火相续。于此时代交替、万象更新之际,为开掘利用本校各相关领域之丰厚学术资源,凝聚研究团队,加强对外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展示亚太中心学术同仁之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彰显南京大学之研究水平与学术风格,我们在《南大亚太评论》、《现代国家治理》、《人文亚太》、《亚太艺术》等学术集刊已相继问世的基础上,决定再做努力,编辑出版《南大亚太论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设门户、画地为牢,绝非智者所为。所谓“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如群流,归于大海”,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现象,惟有将各种研究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方能得到系统透彻的理解,否则便如朱子所言,“见一个事是一个理”,难入融会贯通之境。办教育、兴学术,蔡元培先生主张“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论丛》的编纂,亦将遵循此种方针。

故此,《论丛》之内容,并不限于一般所谓国际问题论著。全球、区域、次区域及国家诸层面,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重要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举凡个人专著、合作成果、优秀论文、会议文集,乃至特色鲜明、裨利教学的精品教材,海外名家、学术前沿的译作,只要主题切合,立意新颖,言之有物,均在“网罗”、刊行之列。此外我们还将组织撰写或译介各种专题系列丛书,以便集中、深入探讨某些重要议题,推动相关研究进程,昭明自身学术特色。

要而言之,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所执守之学术立场,亦即

《论丛》之编辑旨趣：一曰“本土关怀，世界眼光”；再曰“秉持严谨求实之学风，倡导清新自然之文风”；三曰“科学与人文并举，学术与思想共生，求真与致用平衡”。

一事之成，端赖众力。冀望学界同仁、海内贤达继续鼎力支持、共襄此举，以嘉惠学林，服务社会。值出版前夕，爰申数语，以志缘起。

石 斌

2018年元旦于南京

自序——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

冷战后,随着中国稳步迈入既富含战略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的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准备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并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鸣。众所周知,国际关系和大战略理论知识的功能之一,在于努力揭示特定的理论与观念如何影响人的世界观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从而为政策行动提供指南。其中,就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而言,有三个主要因素共同塑造着理论思考。一是现实世界总是不断提出新议题;二是同一传统内部和不同传统之间的争论有助于判定不同议题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学科的影响;三是其他领域学者的影响,特别是方法论影响,有助于指明国际关系学的新方向,进而有助于丰富对国际现实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由于上述三大因素始终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因此没有学者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论思考是完美的。“历史也不可能止步不前,知识的探索永无止境,总会面对新的议题,总会有新的方法可资利用,总会产生新的洞见,总会有新生代学者去继续探求。”^①而对于国务活动家们而言,尽管与学者们有着显著的职责分工,但理论思考同样意义重大且不可或缺。在论及冷

^{*} 本文发表于《国际展望》2013年第6期,收入本文集时结语部分略做修改。

^① [加]罗伯特·杰克逊、[丹]乔格·索伦森著:《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71页。

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和对外政策时,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曾指出,最应当谴责的,是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对外交关系哲学(philosophy of external relations)的理解不透彻,没有足够清晰地表达和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石(theoretical foundation)来支撑其对外行为。^①为此,凯南在美国外交部门多年的官方任职结束后,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制定美国在二战后的困难岁月里的外交政策,并强调为此需要解决好两大问题:概念(concept)和执行(execution)问题,而概念就是政策的理论对应物。^②可见,在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和学者群体均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陆续涌现出一些真知灼见。个人认为,有关中国大战略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辨识清楚以下三大问题: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在理论建构和理论准备方面,决策者群体与学者群体的功能定位与主要贡献;从安全认知、利益界定和力量运用三个根本方面来思考中国的世纪性国家大战略缔造问题。

一、关于中国崛起的大战略理论建构之必需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长,在历经国际风云的激荡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仅越来越成熟、务实和审慎,而且日益强烈地认识到,在追求世纪强国宏大抱负的过程中,在基本政策取向和发展道路选择取得广泛共识且其实践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之后,用以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国家大战略就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

①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3, pp. 95 - 97.

②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p. V, VII.

理论上,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不可能找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究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①威廉森·默里和马克·格利姆斯利的这一论断,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道理:新世纪,随着中国稳步跨入既富含伟大历史机遇又充满严峻考验的战略机遇期,因而可以肯定地说,当今中国需要一项世纪性国家大战略,而这首先有赖于我们较敏锐地感知和把握世界的发展大势,感觉或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的时代大趋势和总体大格局,明了中国在该趋势和格局中的现有位置,辨识它们为中国提供的未来可能和预设的未来限制。^②

换言之,关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的相关理论准备和理论知识(特别是国际关系和大战略方面的学术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它与大战略实践(关于世界政治中的政策活动)有着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在系统思考世界的过程中,理论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必要熟悉理论,因为事实是不会自己说话的。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某组特定的透镜来观察世界,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透镜当成是理论。第三世界是正在发展还是欠发达?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是变得更安全了还是更危险了? 当今各国是更倾向于彼此合作还是竞争? 单靠事实本身是不足以回答

① [美]威廉森·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股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3页。

② 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时股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第10-19页。

这些问题的,我们需要理论的帮助。理论告诉我们哪些事实重要,哪些事实不重要,也就是说理论能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理论以某些价值为基础,通常也包括我们想要世界如何的愿景。”^①当然,就治国方略来说,我们必须熟知的战略理论知识有一项基本的内在要求,那就是:需要将国家的战略必需转化为一般性概念,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治国理政的一般性知识,以此开发、动员和有效配置全社会的资源,使之成为中长期的大战略目标服务。

就大战略研究而言,从理论层次上对国家大战略明晰地进行概念解释的,当首推英国大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此后,战略研究界在探讨大战略问题时,在概念上基本沿袭着他的学术思路,即认为大战略“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所有一切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②大战略是实现国家根本政治目标的综合手段,由此也就决定了大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1) 根本目标(包括在其追求过程的每个阶段上)合理、明确、集中、有限;(2) 对国家诸项基本利益规定和多种政策目的,依据这根本目标及时定出至少在原则上基本明确、连贯的轻重缓急次序;(3) 达到目标与手段(可用资源)之间的大体平衡,避免目标同手段相比严重地过低或过高;(4) 达到不同种类手段相互之间的大体平衡,而就备战和战争期间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外交和经济三类手段分别同军事手段之间的大体平衡。^③

① 杰克逊、索伦森:《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75页。

② [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著:《战略论(间接路线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9页。

③ 张春、时殷弘:《大战略——理论与实例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7期,第71-74页。此外还可参见时殷弘:《战略集中原则与其重大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第1页;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然而,仅仅明晰上述大战略理论内核仍然不够。在《遏制战略》一书中,美国著名战略理论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明确指出,大战略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计算的关系,而这意味着需要同等地关注该项定义中的所有四个要素:计算、关系、目的和手段。如果不存在同等的关注——如果计算变得比被计算的关系更重要,如果手段较目的吸引了更大的注意——那与其说是有个糟糕的大战略,还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大战略。^①可见,大战略研究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和军事这类物质形态的手段是否足够充分和可用,而且需要明了决策者和大众是如何思考和理解权势的,特别是需要明了决策者如何评估和解读权势的分布,以及这种评估和解读怎样塑造着一国的大战略,其中包括战略的优先次序和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

基于上述理念,对于当今中国而言,在大战略理论建构时,尤其需要把握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必须顺应现实政治的内在要求。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虽然初步具备了世界强国的一部分条件,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这就决定了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作为非西方新兴大国这一现实镜像,不做“挑战者”。

二是必须体现世界大国的理性定位。当今时代,国际问题研究不

^①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73.

仅需要深刻关切外部环境对一国国内事务的影响,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大国的重要性不是在于要它们指挥航向,而是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让各国在其间能航行自如。”^①显然,只有大战略才能在确保外交为内政服务的同时,眼光长远地认识到提供公益即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框架,也是大国的基本责任,是一国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中国而言,在21世纪前期赢得世界强国地位不仅有赖于国内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取得进展,还有赖于中国的国际贡献。用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说就是:“中国是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参与者,既是受益者,也是建设者和贡献者。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完美无缺,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变革完善,使之更加公正合理。中国今后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这一进程,包括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继续承担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与义务。”^②

三是必须符合战略缔造的基本逻辑。著名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曾指出,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包括四个基本要素:(1)恢复国内经济实力的基础,特别是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把权势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影响力;(2)保持地缘政治上的军力平衡;(3)管理开放的国际经济,这有助于维持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这一目标且无损国内长远利益;(4)倡导各种多边体制和制度以组织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应对跨国问题和防止过度伸张。^③换言之,在大战略理论思考和建构时,需要对

① [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② 戴秉国:《中国的核心利益有三个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0年12月6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774662.htm>;另可参见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01207/16282003_3.html。

③ 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242.

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予以同等的重视和关注,并将大战略缔造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优化、以确保动态平衡的过程。

四是必须彰显“中国梦”的未来指向。“大国的出现是特定的历史机遇,而且需要具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因素。”^①作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的未来指向不可能像西方大国那样谋求当世界警察、全球银行家和“道德家”,中国的崛起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就是“中国梦”。

二、中国崛起的理论建构之决策者群体

关于一国的理论指导,美国著名的大战略理论家和实践者布热津斯基这样告诫人们:“说到底,动员人们采取政治行动进而塑造世界的正是思想。这些思想既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好的或坏的;可以深刻理解的或只能本能地感觉到的。有时候,这些思想会被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表达出来;有时候只不过流传盛行罢了。我们正处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因此,政治思想大概会越来越重要,它要么成为精神凝聚力的源泉,要么就是混乱之源;要么成为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要么就是冲突的祸根。”^②毫无疑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用以指导国家世纪性崛起的大战略理论思想,是且首先应当是国家决策者群体的战略思想及其集体智慧,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下半期,在世界各国之中,像中国这样几经外交格局大调整的国家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大国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究其原因,除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与中国的

①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②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序言”,第2页。

内部变化有关。”结果是，“在从新生的革命国家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在不断发展，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国同现存世界的关系在不断改变。”^①显然，中国大战略理论思考的决策者群体，首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的战略思考至今仍然影响深远。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正是在这一格局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而开始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就是要从根本上摆脱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列强缓冲区和势力范围的屈辱命运，维护和确保中国独立自主和作为东亚大国的地位。显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根本利益冲突，甚至是武力较量，而这恰恰是对中国人民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的考验。在长期革命和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深深懂得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个道理，而近代中国的历史也深刻地揭示了实力原则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弱国无外交”。对此，周恩来总理有过这样一番论述：“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反对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但和这些人打交道，必须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人家就瞧不起我们，就欺侮我们，凡文事者必有武备，从来如此。”^②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两种：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但对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要有所准备。要和平只能不怕战争，备战才能

① 章百家：《从“一边到”到“全方位”——对50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变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21页。

② 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制止战争,止戈为武,以战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辩证法。他强调,只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做了充分准备,必要时敢于同它们在战场上较量,并赢得胜利,和平才可能被争取到手。^①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思想,中国一面高举和平的旗帜,与世界各国广交朋友,一面敢于以战争来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严重干涉和侵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有“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和“一条线、一大片”等鲜明中国话语色彩的战略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并提出了“三个世界”格局理论,以塑造大战略的基本价值取向。

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则启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指出:“世界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②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③不仅如此,这种革命还是世界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次成功的革命性尝试。在世界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发展步伐实在令人吃惊。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贫穷和孤立之后,中国终于在世界上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就是这场革命的世界性意义。^④与改革开放事业相伴生的,是中国政府提出了真正不结盟和

① 张沁生主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1页。

④ 胡鞍钢:《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载《胡鞍钢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7页。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①的大战略思想主张。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概括的,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至1978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大阶段我国的国际战略虽然有内在联系,但是更有重大区别,其间实现了战略的大转变。”其中,“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为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② 甚至有人这样认为: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对于中国来说,21世纪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业。^③ 正是这场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中的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

冷战结束后,尽管影响大战略缔造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④大战略缔造的内在机理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大战略作为一种外向型行为,其实施的外在环境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务活动家们需要重点探讨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中浮现的、对大战略缔造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大趋势,认清后冷战时代不同于冷战时代的诸多特质,包括物质和心理方面的特质。所以,在21世纪,中国领导人的大战略理论思想尽管具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但同时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发展。

① 对于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作了如下解释:“韬光养晦,就是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壮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过分张扬,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通知》,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② 高放:《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

③ 马丁·雅克:《如果说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原载英国《卫报》2006年5月2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年5月27日。

④ 大战略研究者威廉森·默里在其著作《缔造战略》一书中,至少列举了影响战略缔造的六方面主要因素:地理,历史,政权的性质,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因素,政府和军事体制组合方式等。见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第8-22页。